

中国翻译学发展的几个问题

——兼与王东风先生商榷

丁新华

(中南大学外国语学院, 湖南长沙, 410083)

摘要:就王东风先生《中国译学研究: 世纪末的思考》一文中的几个观点提出商榷, 指出中国译学只能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发展; 对待西方译学应有选择有批判地吸收; 翻译理论必须与翻译实践相结合; 中国翻译学的特色应该予以肯定和保持。

关键词: 中国译学; 翻译理论; 翻译实践

中图分类号: H31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03)03-0406-04

随着新世纪的来临, 中国译学何去何从成为广大翻译工作者普遍关注的问题。为此, 王东风先生率先在《中国翻译》撰文发表了自己的观点^[1, 2]。该文对我国译学做了详尽的探索和思考, 其见解颇为独特, 然而其中关于中国译学发展方向之观点却让人不敢苟同。笔者不揣冒昧, 撰写此文与王先生商榷, 谬误之处, 望有识者斧正。

一、中国翻译学应在继承中求发展

中国翻译学的发展是否应继承中国传统译学理论? 多数人的回答是肯定的。王东风先生仔细研读了大量西方译论(从文后所列参考书目可知)后, 认为我国译论落后于西方译论, 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我们只有清楚地了解中西方译学研究的差距, 找到自己的出发点, 明确自己的目标, 才有可能真正在世界译学之林, 占据一席之地。”^[1 2]但其开篇则说:“我们在纪念《天演论·译例言》发表一百周年的庆贺声中即将合上这一百年的译学研究史, 这标志着译例言对中国译学界的长达一百年影响的结束。”^[1 1]此语不免令人生疑, 严复的“译例言”是否真的过时了? 一种新的、科学的翻译理论是否已经诞生?

我国翻译活动历史悠久, 译学理论的发展也有

着漫长的历史。从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玄奘的“五不翻”到严复的“信达雅”, 再到现代的百家译论, 无不显示出历代译家对翻译理论的探索从未停止过。我国“翻译文论可谓洋洋洒洒, 蔚为大观, 翻译论集也出现皇皇巨著”,^[3]如罗新璋的《翻译论集》, 杨白俭、刘学云的《翻译新论》等。我国的译论不但面多量广, 而且自成体系。正如罗新璋所说:“我国的翻译理论自有特色, 在世界译坛独树一帜。”^[4]他将翻译理论归纳为“案本、求信、神似、化境”等4种。有论者认为我国传统译论具有“评注式、随感式、印象式”的特征, 笔者认为, 正是“评注式、随感式和印象式”的译论构成了我国一部相对完整的翻译史。

“信达雅”理论并非由严复独创, 而是他集前人译学经验之大成的结晶, 严复“将中国译论鼻祖支谦的《法句经序》中出现的信达雅三字重新排列, 合在一起, 明确地把它们作为翻译标准, 站在前人肩上, 成了中国传统翻译理论的完成者。”^[5]可见, 严复的三字理论是深深地扎根于我国民族文化土壤之中的。严复以后的译家及译论很少不受其影响, 如鲁迅的“宁信而不顺”, 林语堂的“忠实、通顺与美”的标准, 傅雷的“重神似而不重形似”, 刘重德的“信达切”以及钱钟书的“化境说”等。严格地说, 上述译论家的翻译标准都脱胎于严复的三字理论, 一个世纪以来, 尽管人们对这三字理论褒贬不一, 但始终未能动摇它在译界的地位。然而, 王东风先生坚持:“我们一直以为中国独有的‘信达雅’, 其实在西方翻译典

籍中早已有之”^[2],并列举了很多实例来证明此说法。事实上,“严复和德莱顿都主张信达雅(泰特勒也有类似译论),这一偶合表明它们普通适用的原则,具有共性和科学性。”^[6]前面提到,严复的三字理论源自支谦的《法句经序》,而“支谦序中引用了老子、孔子作为立论依据;而严复也相似,他引用了儒家经典《易经》和孔子的有关论述作为立论依据,可见严复也是从传统文章学的丰富经验中悟出翻译的道理的。”^{[7] (119)}王文显然忽略了这些事实,他似乎想告诉我们,严复的三字理论源自西方。而人们一般认为,严复在英国未曾接触过西方译论。如果他读过 Lawrence Humphrey, Cowley 及 Dryden 等人谈信达雅方面的书籍,那他的三字理论就更有价值。因为它不仅是我国传统译学的继承者,而且充分吸收了西方译论的养料,它能如此长时期地影响我国翻译界,说明它在我国译学史上的地位很难撼动。王先生大力倡导引进西方译论,但笔者认为,对于这种中西皆能适用,同时又不断地发展的译论,采取废除其指导作用的态度是不妥的。

二、应有选择地吸取西方译论的养料

西方译论亦有漫长的历史。从西塞罗、哲罗姆到马丁·路德及至现代的奈达、纽马克等,其译学理论也是逐步发展起来的。与中国译论相比,西方译论具有下列特征:“1、在实践上不满足于现状,不停留在一个水平上;2、比较重视理论研究,不断提出新的观点和模式。”^[8]在双方进行交流以前,中西译论都有自己的发展轨道。我们不应简单地评价其优劣,因为它们代表着不同语言体系以及不同文化特征。在中西翻译史上,最初的翻译理论家大都是翻译家,其理论大多以译者前言或译后跋的形式出现。提及现代翻译理论,王先生认为现代西方翻译理论家大多是语言学家和文艺学家,因而其译论似乎更具系列性、独创性和科学性。而相比之下,我国翻译理论显得落后,他解释这跟我国翻译史不重视理论有着直接关系。因而他呼吁建设翻译理论和造就大批有学识的翻译理论家。然仔细审视后可以发现,我国历代译家对翻译进行过不懈的探索,成就斐然。“五四”后,鲁迅、郭沫若和茅盾等一代文豪以及钱钟书、赵元任和吕叔湘等著名的语言学家及文艺理论家都“介入了翻译”,他们不但投入了翻译实践活动,而且对翻译理论做了可贵的探索,给后人留下许多

宝贵的译学遗产。但我们对前辈译家的理论挖掘、整理得不够,如能综合地研究其翻译理论,将给我国传统译学注入新鲜血液。

王先生认为:“西方有发达的语言学,而中国的语言学则还十分年轻,”“我们的译论尚不能全面而系统地运用语言学的最新成果来解决翻译问题。”^[11]这其实是在以“西学”为坐标来衡量我国的语言学和翻译理论,从而否认了后者的丰富性及其实用性。西方自有其先进的语言学理论,而我国也有,只不过形式不同罢了。我国现代语言学虽然是在西方语言学理论的冲击下诞生,又是在西方语言理论的规范下成长起来的,如《马氏文通》就是借鉴了西方的理论建立起来从而奠定中国现代语法体系和方法的。但“我们应从中国语言和本体的文化出发研究本族语言观,建立体现汉语精神的语言理论的方法,从而走向世界。”^[9]中国语言学界从来不曾停止过这样的努力。如果一味以西方语言理论及西方译论为标准来贬低和排斥汉语语言及中国译论,其结果是既不能解决我国的问题而且也极大地影响我国译学的发展。

对待西方译论,我们既不能夜郎自大盲目排斥,也不能全盘接受。随着经济和文化的全球化的发展,翻译的功能将越来越明显地显示出来。为了同西方译界沟通甚至对话,我们对西方译论不可不知,应当大量引介,但所引进的译论能否为我所用,还得经受时间的考验。王先生还说:“一旦发现别人有超过我们的地方,就应大大方方地拿起这现成的工具解决我们所关心的问题。”^[2]这与我们所倡导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原则是相悖的。

事实上,我国多数译论家正清醒地意识到,中国译论要实现科学化,必须到中国文化中寻找根据,而决不是到西方的菩提树下摘取一串串现成的果子,这种不经鉴别而坐享其成式地沿用不利于我国翻译学的创新与发展。以奈达的“功能对等”为例,其定义为:“译语接受者对译语中的信息的反应,应与原语接受者对原语中的信息的反应基本相同。”^[10]如果不看他“对译语”接受者的具体论述,他的“功能对等”论是完全正确的。但经过仔细研究,便有商榷的必要了。因为“奈达把译文读者放到了极其重要的地位,即一切都取决于译文读者;而且同一原作,随可能的读者不同,应有不同层次的译文。如果他把这种观点局限于圣经翻译,还可以说得过去,因为基督教徒巴不得译语国家全国人民都信基督教,而‘全国人民’中的确有这样那样的区别。可是,他把这一

观点说成适用于一切作品的翻译,不论是‘世俗’(secular)作品,还是‘宗教’(religious)作品,这就是以偏概全了。”^[11]因此可以说,我们引进并研究西方译论,只是为了开阔我们的视野,从别国的经验中吸取对我们有益的养分,仅此而已。

三、翻译理论应与翻译实践相结合

翻译作为语言活动和思想文化活动,其实践性强于理论性,这是毋庸置疑的。然而翻译实践需要正确的翻译理论作指导。根据理论及实践的辩证关系,我们应当明白,翻译理论来自于翻译实践,反过来又指导翻译实践,同时,翻译实践需要翻译理论的指导,这种实践又可以丰富翻译理论。然而,轻视翻译理论的现象在我国一直存在。主要是由于以前的一些译家并未接触或研究系统的翻译理论,只是在长期的翻译实践中摸索出一系列的经验与方法,并取得一定成就。因而“翻译无理论”一说便四处蔓延。实际上,翻译是离不开翻译理论指导的活动,金隄和奈达合著的《论翻译》就强调:“实际上每个人的翻译实践,都有他的指导原则。”“每个人都有一套翻译理论指导翻译应该做些什么,怎样做和为什么。”^[12]

我国译家历来重视翻译实践,因而从古至今我国的译论都是前人实践经验的总结。但翻译活动极其复杂,译论家的个别经验往往带有主观性或片面性。任何优秀的翻译家不一定擅长于各种题材、各种文体的翻译,因而他们的经验是有限的。如“直译与意译”“形似与神似”“宁信而不顺”以及“文化竞赛论”等都是如此。但将历代译家各自的译论置于一个大体系里,从整体、历史的角度来看,它们无不焕发出绚丽的光彩。王先生没有看到这些闪光点,他说“这些理论都是翻译家的经验之谈,不能算是严格意义的科学理论,但却是科学理论的萌芽。”^[11]

诚然,我国翻译理论发展缓慢,这有着各方面的原因,既有主观的,又有客观的。但我们不能急于求成,以致造成盲目的引进。中国的实情决定我们不能从理论到理论,西方一些抽象、空洞的理论如不能指导我们的翻译实践,势必产生一些负面结果。因此,引进西方理论应本着为我所用的原则,要十分谨慎。何况我国传统译论具有实用性的特征,对翻译工作者颇具指导意义。

王先生提出的“21世纪译学研究呼唤翻译理论

家”^[11]很正确,也符合时代的要求。他鼓励我国翻译工作者积极探索宏观翻译理论,并提出“实践家与理论家”的分野。在此,王先生认识到了我国宏观译论的薄弱性,但我们也不能忽视微观理论的研究。林璋在《1997年中国翻译学研究综述》一文中说:“王克非从翻译的含义入手,把翻译研究分为三类:‘具体的翻译研究,可称为翻译技巧(或方法)研究,属实用研究’;‘翻译文化研究,它将翻译史、翻译与文化的相互作用的研究包括在内,比过去提的翻译史研究有更丰富的内涵。’”^[13]这样划分比较全面,因为翻译研究是庞大的体系,我们不能顾此失彼,应对它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研究。

当然,翻译理论研究者未必都能亲自从事大量的翻译实践。但若没有通过翻译实践,包括间接的实践,如研读对比名译著等等,其理论意义不会很大。同样,译家们也可将自己的译事经验上升为理论,使其具有更宏观的指导作用。

四、中国翻译学应具有中国特色

建立翻译学的呼声早在我国翻译界发出,这表明人们对翻译开始有了全新的认识。但翻译界长期存在着“科学”与“艺术”之争,但始终未能达成共识。尽管也不乏有人从中调和,如金隄的“艺术与科学之争”^[14]以及黄振定的“艺术与科学的辩证统一”^[15]。他们代表了第三派的力量,主张翻译既是科学,同时又是一门艺术。译界除少数人如劳陇等对翻译学的建设提出异议外,在多数人心中已达成共识。

早在1951年董柯斯就提出“翻译是一种科学”。他说:“因为它有一定的规律可以遵循,并不完全靠所谓天才和灵感。”他还指出:“我们首先得考察各种语文的构造、特点和发展法则,各学科的内容和表现方式,各时代和各国家的翻译经验,然后把这三样东西的调查研究所结合起来,构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17](365)}在此,董强调“并非完全靠所谓天才和灵感”,表明他提倡建立翻译学,但并未否认翻译的艺术性这一特征。说明翻译有时还可以靠天才和灵感,特别是文艺翻译。然而他着重强调中西语言、文化乃至译学的对比,即有比较才有鉴别,其宗旨就在于摸索译学规律。我国学者在这些方面作了很多努力,如在中西翻译对比方面,谭载喜先生研究得较深入。而以刘重德、杨白俭等为首的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的宗旨,就是比较中西语言、文学及文化等方面的差异,摸索出双语转换的规律所在。这些都是

建立中国翻译学的正确途径和有益的探索。

翻译学的建立是否应有国别特色也是译界长期争论的焦点之一。有人说科学不分国界,因而翻译学无中西之分。而“我国的翻译理论需要更新与提高,但只能在传统的基础上更新,在原有的起点上提高。而且,语言文字是最带有民族特性的东西,各国的翻译理论都深深植根于本国的历史结构和特定文化土壤之中,中国的译学理论自然也带有中国的民族特色。”^[7](365)]而王先生认为:“中国译学界提出要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翻译学的口号已有多年了,但至今似乎仍停留在口号上。问题的关键似乎是在对中国特色的理解上,中国特色‘特’在哪里,一直是一个很含糊的概念。”^[2]中西语言文化差异较大,将中国文字西译的重任自然落到了中国人肩上。而西方的译学再先进,也只能供我们学习和借鉴,因为它不能解决中西对译中的诸多问题。我们要分析和对比中西语言文化的特征,摸索相互转换的规律,找到中西互译的最佳切入口,这就是在追求中国特色的翻译学。

翻译学的建设任务艰巨,非一两代人所能顺利完成,更何况随着时代的发展,翻译的概念、标准及原则等都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我国前辈译家已摸索出了许多宝贵的经验,诸多现代译人也在不断地摸索,从语言的、文艺的等各个方面进行多视角、全方位的深入细致地探讨,这些都将会深深地打上民族文化的烙印。

五、结语

21世纪中国译学的发展是中国译学研究者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总之,我们首先要立足本国,发扬

中华传统译论之光大,其次充分吸收西方译学中的丰富养料,使我国译学更为完善。这样才能加速我国翻译学建立的步伐,也只有这样,才能促进我国翻译水平的逐渐提高,为中华文化推向世界创造有利条件。

参考文献:

- [1] 王东风. 中国译学研究: 世纪末的思考[J]. 中国翻译, 1999, (1): 7-11.
- [2] 王东风. 中国译学研究: 世纪末的思考[J]. 中国翻译, 1999, (2): 21-23.
- [3] 郭著章, 李庆生. 英汉互译实用教程[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1988.
- [4] 罗新璋. 我国自成体系的翻译理论[A]. 翻译研究论文集(1949-1983)[C].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84.
- [5] 胡德香. 论中国翻译理论特色[J]. 中国翻译, 1998, (4): 2-6.
- [6] 胡清平. 澄清翻译理论研究中的几个问题[J]. 中国翻译, 1999, (5): 2-5.
- [7] 陈福康. 中国译学理论史稿[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2.
- [8] 谭载喜. 西方翻译简史[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1.
- [9] 申小龙. 人文精神, 还是科学主义? • 序[M]. 上海: 学林出版社, 1989.
- [10] Nida Eugene A, Taber Charles.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M]. Leiden: E. J. Brill, 1982.
- [11] 彭长江, 顾延龄. 译海探秘[M]. 长沙: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9.
- [12] 金岳霖, 奈达. 论翻译[M].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84.
- [13] 林璋. 1997年中国翻译学研究综述[J]. 中国翻译, 1998, (3): 40-43.
- [14] 金岳霖. 等效翻译探索[M].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89.
- [15] 黄振定. 翻译学•艺术论与科学论的统一[M].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8.

Some problem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translatology

DING Xin-hua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3, China)

Abstract: The author discusses with Mr Wang Dongfeng on several ideas mentioned in Wang's article "Thoughts on Research of Translatology in China." A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translatology, the author holds that: People should carry forward the traditional translation theory in China, absorb western translatology with a critical view, and combine translation theory with translation practice, Chinese translatology should have its own characteristics in its development.

Key words: Chinese translatology; translation theory; translation practice